

导读



史诗重述的现代命运

阿来关注的中心个偏向在《格萨尔王传》的现代化。他思索在现代世界面前,史诗最终将会人散歌歇的困境。史诗存在形式的变化,会是灭亡其自身的因素。

► P24



被遮蔽的通学之才

潘光旦把现代生物学的基本理念和对中国现实与传统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中和而客观的社会思想。这样一种思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当代中国,当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

► P25

书屋

社科:作为斗争形式的亚文化
经管:廓清成本上的迷雾
科学:我们与祖先,神似多少
少儿:幽默·奇幻·诗意

► P26~30

书事件

为什么是梁文道

■林东林

几家书店逛下来,显要之处总能见到梁文道的书,看来最近他是无处不在了。

今年以来,梁文道“转战”内地,一月《常识》初试啼声,三月是《噪音太多》,四月是《我执》。连我朋友的MSN签名,一时都换成了“《常识》是姐,《我执》是妹,道长是爹”。近来,《读者》又大面积地铺开,而随之梁文道那著名的头颅和酷脸也跟着辗转腾挪。

《常识》和《我执》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噪音太多》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而《读者》出自法律出版社。四本书换了三家出版社,似乎并不多见,想是梁文道的书十分畅销,每家出版社都来活动,争着分到“一杯羹”,以至于弄得“道长”也为难,要多分几家平怨气。

而说到梁文道道长,这也是近年来两岸三地的红人一个了。

他的成名,也着实要拜凤凰卫视所赐。梁文道参与的节目,凤凰台专辟有两档,一档是《开卷八分钟》,由梁文道介绍时新读物,虽仅八分钟,却也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而另一档则是《锵锵三人行》,每期一般是窦文涛、梁文道再搭档一个嘉宾,笑谈时髦话题,嬉笑怒骂,纵论古今中外。“道长”的盛名,即是靠这两档节目日积月累地狂轰乱炸所致。

但是梁文道的走红,其实说白了,只是电视媒体的走红,并不是梁文道思想的走红,说起来“道长”也真谈不上思想,说来说去都是拾人牙慧的东西,假他之口说出来罢了,只是他比较勤快,看的书多,又博闻强识,节目上能随时随地用起来,但他也仅是个纽带,穿针引线,把这些东西串起来而已。他就是筋,是韧带,是经纬。而他的作用,却不具备原创性和思想性的意义,他的意义是传播学的意义。你翻看他的书,满篇里都是意义,都是思想,但是你找不到人,找不到感情,找不到关怀,或许你说他不是文学家,不承担这样的义务,不错,他是不承担这样的义务,但是我要说的是,你也不要把他捧到一个多么高的地位。

梁文道也不是神,不应承受顶礼膜拜,他只是现代传播链条上的关键一环。

如今,实在要算是电视媒体最走红的时代。《百家讲坛》捧红了那么多主讲,凤凰卫视捧红了那么多主持人和评论员,这是前所未有的。电视媒体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被充分开掘了出来,传播评论,传播见解——你不会分析不要紧,有人帮你分析;你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要紧,有人帮你评论。电视不再是靓女帅哥的天下,电视要扮演深度,要扮演智慧,于是各色人等都可以来走一遭,所以阮次山、曹景行、杨锦麟、窦文涛、梁文道们能走红。

一个时代伟大不伟大,我觉得还是要看原创的力量,创造的力量,人的力量。评论再怎么热闹红火,也都是谈资,是消费,是消遣,是茶余饭后,是细枝末节,只有人、人生、创造、故事才能体现一个时代的强大和风采。而评论如今能大红大紫,由此可见,时代也似乎干涸很久了。

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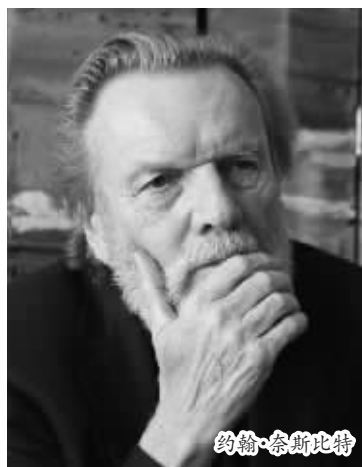
奈斯比特 期待中国

■柴玉琳 本报记者

《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中国名声太盛,常被冠以“大师”、“预言家”等名号,似乎有“走向神坛”之势。他在《中国大趋势》中总结的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包罗以下诸项: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和太太不懂中文,是如何读懂中国的,又让人好奇。

由于奈斯比特夫妇此次来北京的时间刚好与奥巴马访华行程部分重合,因此有小道消息说他们将与中美两国元首会面。听到传闻,他答道:“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然后便开玩笑说,“我确实与他们同处一个城市,正等待与他们见面呢。”之后,他便打开了话匣子,与我们讨论传闻与事实的问题。

奈斯比特问我:“你相信传闻吗?我是不相信的。”接着我们谈到了他的新书中有关中国社会的事实与他的“内容分析法”。多丽丝表示,为真正了解中国,他们成立了工作室,组成了一个拥有28名成员的研究小组。研究人员每天将各地的中文报纸翻译成英文,供



约翰·奈斯比特

奈斯比特夫妇参考分析。他们对资料进行分类编排,建立索引分析比较。奈斯比特每天都会读《中国日报》,并不断地和中国各阶层的人进行沟通。

对于报纸报道的立场和真实性,奈斯比特表示,对于同一件事情,他们会参考不同媒体的报道,最后理出真相。他始终认为,重大的社会变化都是从地方开始,自下而上的。因而通过对城市、乡村变化的研究和分析,能够

判断出将来的发展趋势。

采访中奈斯比特一直表示,自己不是预言家,他很少进行预测,只是通过对事实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写作《中国大趋势》之前,他们夫妇并没有制定具体的计划,只是不停地寻找有关中国的事实。他说:“分析一个事物或者社会的发展方向,首先要找到它的价值趋向,比如这个社会奖励、推崇什么,惩罚、鄙视什么。”

他认为,中国30年来的巨变非常惊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甚至相悖。许多西方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便开始制造“中国威胁论”。其实,中国和他们应该是朋友,而不是对手。他说:“其实,全球化并不是美国化。全球化应该是各个国家的经济独立,而联系密切。”多丽丝补充道:“欧洲有很多声音,所谓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其实他们内心希望在全球推行欧洲模式。欧洲在经济上已取得成功,他们的发展状况与中国不在同一个阶段。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他们感到了威胁。”

在奈斯比特夫妇的眼中,中国体制不可替代。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奈斯比特指出:“中国的未来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它将由中国人创造。未来发展的答案将由你们来告诉我。”

关注

从韩寒的角色扮演说起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印象中,韩寒本来或者一直很火,而最近似乎变得更火了。他不但成了《南都周刊》的封面人物,更成为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重点报道的人物。但两家刊物的判断还是有所区别的。《南都周刊》眼里的韩寒是“公民韩寒”,扮演的角色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在《时代》周刊那里,却是“中国文学的坏小子”(China's Literary Bad Boy)。

对此定位,韩寒以他惯常的言说风格做出回应。当《青年周末》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待别人封你为‘公共知识分子’”时,答复如下:“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厕所有时候是一样的,供人临时发泄,泄完了还不打扫,并且必须是免费的,你要是收五毛钱草纸费就还得踹你两脚墙。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公共厕所,那么很多人只能在街上拉屎了。所以这个角色有时候其实很可悲的。但是,如果整个城市的人,哪怕家里有卫生间的人都来这个公共厕所大便,那么这个社会也许是乐观的。”这是一个很机智巧妙也很“混不吝”的回答。让人看到韩寒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通过他的“解构”,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也变得意味深长了。

韩寒已扮演过多种角色。起初,他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三重门》把他打造成了一个叛逆者。后来,他被媒体标举为“8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再后来,他变成了一名职业赛车手,也改变了旧时代文人白面书生弱不禁风的形象。而自从他开博,又成了“意见领袖”。据说,一旦有公共事件发生,许多人就会去韩寒的“自留地”里瞧瞧,看他如何说。那些说法通常都是机智、一针见血的,看者无不称快。于是韩寒开始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2008年网上流传的《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中,韩寒与艾未未、北岛等并列其中。这意味着韩寒已不是当年的韩寒,已具备在公共问题上发言的能力和强大的号召力。

尽管如此,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还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比如,一位朋友与我讨论公共领域问题,便对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王朔很是不屑。依此类推,韩寒岂不是也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有了一个如何看待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自知识分子诞生后,其传统已被左拉等人反复固定与润色。在西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传统似已难以以为继。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按

笔者看,以1989年为界,中国也发生了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转型。西方人发明了“公共知识分子”一词,中国的媒体也借用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用“知识分子”指称大家熟知的那种形象,本已足矣,之所以还“公共”一下,其实是一种拯救行为。

当然,中国的情况更复杂。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其公共性往往比较弱。虽然他们从没停止言说,但常常是面向专业问题而非面对公共问题;即使是,也常常浅尝辄止或欲言又止。相比而言,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胆子更大、冲劲更足。他们讲究说话技巧,看重表达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于是,当体制内知识分子沉默不语或窃窃私语时,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则大踏步地走进了公共领域。当年的王朔如此,如今的韩寒也如此。在此意义上,韩寒及其同道确实肩负了拯救知识分子的重任。

然而,在韩寒究竟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还有些犹疑。如果是,他离我理想中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距离;说不是,谁又能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呢?也许,我们不应该把那个标签看得太重,重要的是一个时代应有它的声音。韩寒以独特的表达方式撞击着时代那堵厚厚的墙,撞击出种种喜剧色彩乃至闹剧色彩,这已经足够了。